



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

陈寅恪先生传

蒋天枢



陈寅恪先生，江西修水人。生于光绪十六年庚寅（一八九〇）旧历五月十七日乙酉。时寓居湖南长沙周氏蜕园，唐诗人刘蜕故宅地也。生时祖母黄夫人以先生生值寅年，为取名寅恪（恪为兄弟间排行字）。父三立，字伯严，号散原。光绪十二年（一八八六）进士，授吏部主事。以侍父告归。有散原诗集、散原文集。母俞明诗，山阴俞明震恪士之妹。能诗而擅鼓琴。有《神雪馆诗集》（未刊）。先生生时，值祖父宝箴赋闲侨居。其年秋，始授湖北按察使。昔年枢曾问先生之字，先生语之曰：“忆闻余初生时，适九十老人熊鹤村来，先祖拟以鹤寿字余，然此字未曾使用”。又闻老友吕贞白云：闻诸彦通，先生字规庵。然未闻先生言及。生平以名行。修水县旧名义宁州，学者或称义宁先生。

第一章 求学时代

昔年尝闻先生幼年居湘时，家人为聘湘人周姓者为塾师，授先生兄弟读。考先生祖父宝箴于光绪二十一年八月授湖南巡抚，时先生六岁。兄隆恪《长沙将见六弟于抚署》诗自注：“旧抚署东西院内各植桂树一株，大可合抱，童时常与诸弟嬉游其下。”（诗作于民国五年）疑先生入塾受书时全家已移住抚署内。唯所谓周姓塾师不详何名。后读先生兄师曾《范四十集·蜗牛舍诗集序》中云：“吾师周印昆先生论吾父诗为有清诗人之殿，亦旧诗之殿。”此周印昆殆即居湘时塾师。杭州叶卷盒藏书目录载《夕红楼诗集》八卷、《夕红楼诗续集》三卷（余未见续集），注云“湘潭周大烈，字印昆”。则周姓塾师名周大烈。其人生平犹可于《夕红楼正续集》两册中考见。光绪二十八年壬寅（一九〇二）先生十三岁，随兄衡恪东渡日本留学。嗣以假期归，又与兄隆恪同考取官费留日。十七岁时以病回国疗养，次年插班考入吴淞复旦公学。宣统元年（一九〇九）夏，复旦公学毕业（时复旦公学相当高中程度，后迁校江湾始办大学）。时年二十岁。秋，由亲友资助赴德，考入柏林大学。一九一一年秋，入瑞士苏黎世大学。一九一二年（民国元年）旧历春，以资用不给，由瑞士暂时归国。次年春赴法，就读巴黎大学。一九一四年（民国三年甲寅。阳历八月，欧洲大战起。）春，仍在巴黎大学，江西省教育司（即厅）司长符九铭电召回江西南昌，阅留德学生考卷。并许补江西省留学官费。一九一五年（民国四年乙卯）春至京，曾短期任全国经界局局长蔡锷秘书。及袁世凯方筹谋称帝，先生《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》文云：“忆洪宪称帝之日，余适旅居旧都，其时颂美袁氏功德者，极醜怪之奇观。深感廉耻道尽，至为痛心”。一九一六年（民国五年丙辰）八月，总统黎元洪特任谭延闿为湖南省长兼督军。谭为散原老人旧交，延聘先生至湘，任职湖南交涉使署。清华大学部第三级同

学卡慧僧《怀念陈寅恪先生》文（未发表）云：

往者先生讲史，言档案之用，尝谓：曾在湖南交涉署工作。初至时，终日披阅档册。对外交涉，不能仅凭条文，自逞臆断。必熟于案例，事来方能举措得体，不致貽笑或债事。

又云：先生于民国五年至长沙就交涉使署事后，疑中间未尝离去，故有“丁巳秋客长沙寄寓寿星街雅礼学会即文慎公旧第”语也。

按下文所言，甚是。（后引简称下“记”）。疑交涉使署即附设旧抚署内，而雅礼学会则先生住处也。

先生自民四年寓京，继又至湘，此期间先生有《琐窗寒》、《破阵子》、《浣溪纱》词三阙，载早年《东方杂志》（十三卷第十一号文苑栏，民国五年十一月发行）。传世之词仅此三阙而已。从词意约略可见在京、在湘时意绪：有“莫把寻常花月恨，谱入钿箏旧雁弦，春城话可怜。……冷落闲门逐锈鞞，东风伴醉眠。”及“来住江城惆怅客，泪痕和墨教题诗，洞房空想碧螺卮”之句。前年江西教育厅虽有给予官费之说，究于何时实现，未详。而三年积资，恐亦不丰。一九一七年（民国七年）冬，经由上海赴美，入哈佛大学。学梵文、希腊文等。在哈佛识涇阳吴雨僧宓，遂为挚友。后又继续在哈佛学习梵文、巴利文二年。一九二一年（民国十年），先生三十二岁。秋，离美再赴德，入柏林大学研究院，研究梵文及其他东方古文字。民十二年癸亥迄次年甲子（一九二三、二四），仍在柏林大学研究院研究梵文、巴利文、藏文等。时国内时局动荡，江西教育厅官费，时停寄，此数年间在德生活至为艰苦。当是时，毛子水、傅斯年、俞大维等均在柏林。毛谓：“陈寅恪及俞大维是他在学问上最心服的朋友。一九二三年（民十二），赵元任先生拟辞去美国哈佛大学教职回国，须觅一哈佛出身者代替，函先生徵求同意，复书云，我对美国一无所恋，只想吃波士顿醉香楼的龙虾。这当然是不要来的开玩笑说话”。（见杨步伟著《杂记赵家》）这年下半年，赵夫妇亦到德，《杂记

赵家》说：“到了柏林，值战后德国马克正低，书呆子们大买各种书籍，并且还流传着好玩的批评，说陈寅恪和傅斯年是宁国府门前一对石狮子，是最乾淨的”。又说：“有一天俞大维和寅恪请我们看德国歌剧，他们两人送到戏园门口就要走，我问：你们不看吗？大维笑笑，寅恪说我们两个人只有这点钱，不够再买自己的票了，若要自己也去看，就要好几天吃乾面包。我们心里又感激又难过地领他们这回情”。（这时赵夫妇经济宽裕，在德过了四十天，除上述几人外，还见到童贯贤、何思源、罗志希、张幼仪、徐志摩等）由这些轶事，可见先生当时在德生活概况。昔年先生尝语枢：在德时曾读德文版马克思《资本论》。或谓先生不读马列书者，误也。

癸亥年（民国十二年）夏秋间，先生母俞暨长兄师曾相继逝世，家中以经济窘困，未告知。故先生民国十二年在德《与妹书》尚有“请大哥和五哥在北京收购满蒙回藏文书”语。（全文载一九二三年《学衡》二十期）现节录如下：

我前见中国报纸告白，商务印书馆重印日本刻大藏经出售，其予约卷价约四五百元。他日恐不易得，即有，恐价亦更贵。不知何处能代我筹措一笔款，为购此书。因我现必需之书甚多，总价万金。最要者即西藏文正续藏两部，及日本印中文正续大藏，其他零星字典及西洋类书百种而已。西藏文藏经，多龙树马鸣著作而中国未译者。即已译者，亦可对勘异同。我今学藏文甚有兴趣，因藏文与中文，系同一系文字。如梵文之与希腊、拉丁、英、俄、德、法之同属一系。以此之故，音韵训诂上，大有发明。因藏文数千年已用梵音字母拼写，其变迁源流，较中文为明显。如以西洋语言科学之法，为中藏文比较之学，则成效当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。然此非我所注意也。我所注意者有二：一历史，……一佛教，大乘经典，印度极少，新疆出者亦零碎。及小乘律之类，与佛教史有关者多。中国所译，又颇难解。我偶取金刚经对勘一过，其注解自晋、唐起至俞曲园止，其间数十百家，误解不知其数。我以为除印度、西域、外国人外，中国人则晋朝、唐朝和尚能通

梵文，能得正确之解，其余多是望文生义，不足道也。隋智者大师天台宗之祖师。其解悉檀二字，错得可笑。好在台宗乃儒家五经正义二疏之体。说佛经，与禅宗自成一派。与印度无关者相同。亦不要紧也。禅宗自谓由迦叶传心，系据《护法因缘传》。现此书已证明为伪造。……旧藏文既一时不能得，中国大藏，吾颇不欲失此机会，……又蒙古、满洲回文书，我皆欲得。可寄此函至北京，如北京有满、蒙、回、藏文书，请大哥五哥代为收购，久后恐益难得矣。

由上所录文，足见先生归国前思想梗概及治学方向。以上是寅恪先生求学时代的概况。

第二章 在清华园与南迁北返

民国十四年（一九二五）。北京清华学校系外交部以美退还庚款创立，创办于宣统元年（一九〇九），特赐清华园建校，故校名清华教务长张彭春（字仲述）倡议，经外交部批准：停办留美子部，创办国学研究院、并大学部。于本年開始在全国招收第一届新生。研究院旨趣，取法于吾国书院、并仿英国牛津导师制。其初经多方筹商，聘请王静安、梁任公、赵元任、及寅恪先生为教授（毕业证书上所列教师名衔均称导师）。先生以经济拮据，预支清华薪金，始克由德返国（戴幼和述师言）。归后，以父病暨母兄葬事请假一年，明年秋始到清华任教。到校后，初住工字厅，与王静安先生识趣特契，时与先生话旧事，后来挽词中所谓“回思寒夜话明昌，相对南冠泣数行”者是也。后来王、梁两先生相继逝世，惟寅恪先生巍然为清华泰斗。民国十七年戊辰（一九二八），先生三十九岁，秋七月十七日与师母唐筭（字晓莹）在沪结婚。时散原老人寓沪。婚后，以开学在近，只身返清华。先生性幽默，一日，同学多人在师家，师云：我有个联送给你们：“南海圣人再传弟子，大清皇帝同学少年”。大家哄堂大笑。次年，研究院同学为静安先生树立纪念碑于校园工字厅东偏，乞先生为“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”，文中抒发思想自由之

谛义。今碑已被毁，手边仅存拓片裱本而已！庚午（一九三〇）秋，先生有“阅报戏作”二首，其一云：“弦箭文章若未休。权门奔走喘吴牛。自由共道文人笔（早年潘伯欣北京打油诗，有“欲将东亚变西欧，到处闻人说自由”之句），最是文人不自由”。本年夏，国民党教育部易原清华学校校名为清华大学，并改隶教育部，清华自易名后，先生任中文、历史、哲学系合聘教授。并为中文研究所、历史研究所开专题课，如“佛经文学”、“世说新语研究”、“唐诗校释”、“魏晋南北朝史专题研究”、“隋唐五代史专题研究”等。是时先生授课之余，精研群籍，史、集部外，并及佛典。早年居金陵，与支那内学院邻近，已泛涉佛典，至是更进而为译本佛经之研究，以高丽藏本校梁慧皎《高僧传》，眉间细字密行，间注梵文巴利文，盖欲为之笺证而未成也。先生在读《高僧传》时，别有论译经传播事业者：“据《高僧传》前三卷，译经门正传及附见者凡六十三人，而号为天竺人者仅十六人。而此十六人中如摄摩腾、竺法兰、鸠摩罗什等，或本人之存在不无可疑，或虽源出天竺而居月支，或竟为龟兹人者尚有数人。然则自汉明迄梁武四百五十年间，译经诸大德，天竺人居四分之一，其余皆罽宾、西域及凉州之人，据此可知六朝文化与中亚关系之深矣”。又云：“间接传播文化，有利亦有害：利者，如植物移置，因易环境之故，转可发挥其特性而为本土所不能者，如基督教移植欧洲，与希腊哲学接触，而成欧洲中世纪之神学、哲学及文艺是也；其害，则展转间接，致失原来精意，如吾国自日本、美国贩运文化中之不良部分，皆其近例。然其所以致此不良之果者，皆在不能直接研究其文化本原。研究本原首在通达其言语，中亚语言与天竺同源，虽方言小异而大致可解，如近世意语之与拉丁。按《出三藏记集》卷八僧叡大品经序谓‘胡音失者，正之以天竺’。盖古译音中如弥勒、沙弥之类，皆中亚语，今日方知。足证当时实此类之经本。然其所译，仍大抵是梵文，犹天主教人贲译诸书皆拉丁文之

本，而音译名字犹存法、意土音也。由此可知中亚人能直接通习梵文，故能直接研究天竺之学术本源，此则间接之害虽有亦不甚深也。至其利，则中亚大、小乘俱盛，大乘盛于阆。如朱士行在于阆，为彼地小乘所嫉，然实于其地得放光般若梵本，又经于阆僧无罗叉等之翻译。至东晋法显《佛国记》云：‘于阆众僧乃数万，多大乘也’。则于阆必已盛弘大乘。今所掘发区域，于阆近旁多大乘经典；而天山北路，小乘夙盛。卑摩罗叉，十诵大师，先在龟兹，弘阐律藏。玄奘《西域记》：‘屈支诸国皆说一切有部’。今德人发掘库车诸地，所得有部律本甚多。可徵六代李唐小乘之学行于天山北路，旧籍所记良不诬也”。于此可徵先生以多方面史料证发旧籍之功。民国二十一年壬申（一九三二）夏，中文系代理系主任刘文典请先生命招生试题：作文题《梦游清华园记》，外加对对子：一年级为“孙行者”、“少小离家老大回”，二、三年级、转学生有“莫等闲白了少年头”等，以此招致纷纷非议。先生既在《清华暑期周刊》第六期发表《答记者问》，又撰《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》，详释其义。是年一月，日寇侵占上海闸北，继又成立伪满洲国。三月十三日，先生假吴雨僧工字厅住室与同学谈话，谓：“国难会议”列吾名，不拟参加。又，本年开《晋至唐文化史》课，讲晋至唐这一历史时期的精神生活与物质环境之关系。谓精神生活包括思想、哲学、宗教、艺术、文学等；物质环境包括政治、经济、社会组织等。在讲论中，不轻易讲因果关系，而着重条件。并谓：以任研究文化史有二失：旧派失之滞。旧派所作中国文化史，其材料采自廿二史中儒林文苑等传及诸志，以及《文献通考》、《玉海》等类书。类书乃供科举对策之用，作史没有必要全行采入。这类文化史不过抄抄而已。其缺点是只有死材料而没解释。读后不能使人了解人民精神生活与社会制度的关系。新派失之诬。新派是留学生，所谓“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”者。新派书有解释，然甚危险。他们以外国的社会科学理论

解释中国的材料。此种理论，不过是假设的理论。其所以成立之原因，是由研究西洋历史、政治、社会的材料，归纳而得的结论。结论如果正确，对于我们的材料也有适用之处。不过也有时不适用，因为中国的材料有时在其范围之外。所以讲“大概似乎对”。讲到精细处则不够准确。而讲历史重在准确，不嫌琐细。本课程的学习方法，就是要看原书，要从原书中的具体史实，经过认真细致、实事求是地研究，得出自己的结论。一定要养成独立精神，自由思想，批评态度。（以上录“下记”）从这些记录，可看出先生的生活态度和教学方法。

民国二十二年（一九三三），先生四十四岁。本年，有《复钱稻孙书》，内容为答复日本学者白鸟库吉询问有关中亚史问题。陈哲三《陈寅恪轶事》文中述兰孟博语云：“民国二十二年我在日本，有天在东洋文库吃饭，饭后大家闲谈，白鸟说：‘蓝君你认不认得陈教授？’我答：‘是不是陈援庵？’他说：‘不是，是陈寅恪先生’。我说：‘那是恩师。’白鸟一听，马上隔桌趋前伸过手来。白鸟在日本史学界，被捧得如太阳，如何对陈先生如此尊敬呢？他说了，他研究中亚问题，遇到困难，写信请教奥国学者，覆信说向柏林大学某教授请教，而柏林的覆信说应请教陈教授，当时钱稻孙度春假来日，正住隔房，他说可以代为请教陈教授，钱的春假未完，陈教授的复信已到，而问题也解决了。他说如无陈教授的帮助，可能至死不解。”不识当日钱将此信原封给与白鸟库吉，还是使白鸟录副而自将原信留起？如能获得原手迹，将可存寅恪先生一段重要文献。

乙亥（一九三五）春，陈垣著《元西域人华化考》一书刊成，先生为之序，言：“近二十年来，国人内感民族文化之衰颓，外受世界思潮之激荡，其论史之作，渐能脱除清代经师之旧染，有以合于今日史学之真谛，而新会陈援庵先生之书，尤为中外学人所推服。盖先生之精思博识，吾国学者，自钱晓徵以来未之有也。

今复取所著《元西域人华化考》，刻木印行，命寅恪序之。寅恪不敢观三代两汉之书，而喜谈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，故承命不辞。欲藉是略言清代史学不振之由，以质正于先生及当世之学者”。陈著既体大思精，足挽狂澜。而先生之序亦足发其凡也。

丁丑（一九三七），先生四十八岁。阳历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发生。七月二十八日，京郊有激烈战事，当夜二十九军撤退。八月八日正午日军入城。津沽旋亦沦陷。时散原老人在京就养，难作，发愤不食五日死。先生在“文革”中交代稿所言“七七事变，北京沦陷。八十五岁的老父亲因见大局如此，忧愤不食而死”者是也。先生与兄隆恪、弟方恪、登恪等料理父亲丧事毕，于满“七七”后，离京转津南行，以其时清华议迁长沙故也。沿途备历艰辛，于十一月下旬始抵长沙。未几，由于时局变化，清华大学临时校址又决定迁云南。于是先生携家再南下，经香港转滇。抵港后，师母因沿途劳顿过度，心脏病发，留港。时许地山任香港大学教授，代为租赁房屋，安顿师母及流求、小彭、美延。先生则于翌年（一九三八）春节后，只身经滇越铁路去云南蒙自，到蒙自后即感染疟疾。未几，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、南开大学合并为西南联合大学，校址设昆明。先生在蒙自授课仅数月，于己卯（一九三九）春，再由蒙自移居昆明。寓靛花巷青园学舍。系中研院所租楼房，劳榦、郑天挺、邓广铭等均寓其处，得以朝夕晤谈。时家属仍寓香港，以货币贬值，薪资寄到香港换成港币后很难维持生活。师母出医院后，不得不寻觅租金低廉住处，以故在港四年，搬家六次（均流求笔记）。由上具见先生离京后生活之艰辛与窘困也。

己卯（一九三九）春，先生五十一岁，仍在西南联大授《魏晋南北朝史》、《隋唐史》，并为研究生开《白居易》。旋于是年春季，受英国牛津大学汉学教授之聘，并授予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职称。程綏楚用金圣叹笔名著文云：“先生在战时应牛津之特聘，主

讲东方汉学，全欧汉学家云集于奥格司佛城，女史学家陈衡哲评之曰：“欧美任何汉学家，除伯希和、司文赫定、沙畹等极少数人外，鲜有能听得懂寅恪先生之讲者。不过寅公接受牛津特别讲座之荣誉聘请，至少可以使今日欧美认识汉学有多么个深度，亦大有益于世界学术界也”。此余在上海中央研究院办事处后住宅中，亲闻于衡哲女士者”。暑假后离昆明赴香港，拟全家搭轮去英伦。抵港后值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，滞留香港。秋九月，重返昆明。《己卯秋发香港重返昆明作》诗有“残腾河山行旅倦，乱离骨肉病愁多”之句。次年三月，由昆明赴渝，出席中央研究院会议。《庚辰暮春重庆夜归作》诗有“食蛤那知天下事，看花愁近最高楼”之句，吴雨僧释云：“某巨公宴请到会诸先生，寅恪初见某公，深觉其人不足有为”。先生对世务之观感有如是。时物价涌涨，生活艰苦，诗有“淮南米价惊心问，中统银钞入手空”，纪实也。师母仍卧病香港，先生暑假后再至港，待机赴英，既不能成行，就任香港大学客座教授。辛巳（一九四一），先生五十二岁。是年春，完成《唐代政治史述论稿》，稿本序文末署“辛巳元旦陈寅恪书于九龙英皇太子道三百六十九号寓庐”。（是年八月四日许地山卒于香港）是年旧历十月二十日，太平洋事变作，日本人占领香港，先生离香港大学闲居。如非日本挑起太平洋战争，先生赴英伦事或终能成行，虽已发现眼疾，倘得良医治疗，将不至于失明。际遇之颠连如此！先生虽处如是之困境，仍于十月末校读完《新唐书》第二过。继又购得商务本宋李心传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十二册，于本年“岁不尽四日”（见跋文）读完。先生治学之勤劬又如此！次年（壬午），仍困居香港。正月至春末，再校读《新唐书》第三遍。直至五月五日，始由香港取道广州湾返内地，六月末抵桂林，在桂林留一年余，“广西大学送来与中英庚款会约定之聘书”（见与傅孟真书），遂暂留任教于广西大学。有《夜读简斋自湘入桂林诗感赋》诗，有：“只谓潭州烧小劫，岂知杨獠舞多姿

（自注：简斋诗：杨猴舞吾侧。）还家梦破恹恹病。去国魂销故故迟”之句，足见自伤身世之哀感。癸未（一九四三）秋八月，由桂林启程北行，于十一月抵重庆，因病少留。继即转赴成都，以全家患病，于旧历年底始达。任教于燕京大学。次年有《病榻作时目疾颇剧离香港又三年矣》诗，中云：“携家未知家何置。归国唯欣国尚存。四海兵戈迷病眼，九年忧患蚀精魂。”足见离京南行后生活，实感慨万千。

乙酉（一九四五），先生五十六岁。正月，因生活艰苦，营养很差，左眼视网膜剥离加重，终致失明。虽经医生施手术，未奏效，并因手术时把视网膜搞皱，致后来无法再弄平。（是年八月十日，日本投降）是年秋，英国牛津大学约先生赴伦敦疗治目疾。希能痊愈，仍留牛津讲学。于是由成都搭机去昆明，再经印度乘水上飞机去伦敦。抵英后，由于第二次大战方结束，国外生活亦不好，营养较差，虽经用电针贴合视网膜，由于网膜皱在一起，无法复原。明年春离英归国，绕道美国，阳历四月，达纽约原拟再试医疗，后闻美国名医亦无良策，遂决定不登岸。仅得与旧友赵元任夫妇及留美学生周一良、杨联升等晤叙。时为丙戌三月十八日，一九四六年四月十九日也。

先生自丙戌十月经南京转沪乘舱返清华后，明年丁亥春，修改前在成都所草《元白诗笺证稿》，助先生工作者为研究生陈庆华、王永兴等。时事日非，眼又不见，名书斋曰“不见为净之室”。时钱稻孙在日本，函请物色元稹《长庆集》善本，未得，别为购日本影印《法显传》寄来（见钱明信片）。冬，寒甚，清华因经费绌，无力供暖气，需住户自理，先生生活窘困，不能生炉火，将所藏巴利文大藏经及东方语文各书，如蒙古文蒙古图志，突厥文字典等，卖与北京大学东方语文系。用以购煤，闻仅以一室装火炉而已。此后两年间，虽备历艰苦，仍继续讲学及著述。有《丁亥除夕作》诗云：“杀人盈野复盈城，谁挽天河洗甲兵。至德收

京回纻马，宣和浮海女真盟。兴亡总入连宵梦，哀废难胜伐岁觥。五十八年流涕尽，可能留命见升平。”诗情哀而意切。未几而升平果至矣。

第三章 南迁岭表

当戊辰（一九四八）阳历十月间，北平已面临解放。其时清华附近闻炮声，先生携家避入城内。师母《回忆录》云：“因清华大学北边一带炮火很密，寅恪携家入城，暂住在师曾大嫂家中。只一二夜，又迁入中研院宿舍。当晚有人来说，明晨有一便机往南京，请陈寅恪先生同搭乘。据说是傅斯年打来的电话。次晨即往南苑机场搭此机离开北京。同机除胡氏夫妇外不识者二十余人。我们在南京只住一晚，即搭夜车往上海。”在沪，接受广州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聘约，岁杪，全家在沪乘秋瑾号轮去广州。岭大派校船到广州黄浦江口，直接接全家到学校码头。住进西南区五十二号。先生在沪时，值胡适来沪，劝先生同赴台湾，拒之。到广州后，傅斯年屡电催赴台，不往。在岭大兼历史、中文两系教授。五〇年冬，《元白诗笺证稿》线装本印成。一九五二年夏，迁居东南区一号楼上。是秋枢赴粤晋谒，即在此寓。枢之至粤，岭南大学名义尚存，未几而广州有院系调整令，岭南大学名义取消，原中山大学迁入岭南大学校舍，先生继续任中山大学教授。一九五三年旧历九月，开始撰写《论再生缘》。一九五四年春，国务院派原在清华任先生助教之汪篔来穗，迎先生赴京，任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。先生恋广州气候煦和，谢不就，荐陈垣代己。本年春，《论再生缘》初稿完成。开始撰写《柳如是别传》。一九五五年春节，先生撰联标门曰：“万竹竞鸣除旧岁，百花齐放听新莺”。（师母以枢能喻旨，亲书一联寄赐。今犹存。）时“反右”将起，有记者谒先生请“鸣放”，先生笑指门上春联示之。五八年批判“厚古薄今”运动开始，先生受到批判，遂

不再教课，专力著述。本年七月有寄赠吴雨僧诗三首，其一云：“葵羹桂醪足风流，春雨初晴转似秋。桑下无情三宿了（吴注：见《后汉书·襄楷传》及东坡别广州诗），草间有命几时休。早来未负苍生望，老去应逃后死羞。传语朋友同一笑，海南还胜海西游。”一九六一年秋，吴雨僧离渝外出访友，先至武汉大学访刘永济，刘《减字木兰花》赠别吴雨僧词序云：“雨僧由渝来汉，小住四日即赴穗。再入都，然后西去”。吴至穗后，与先生晤谈甚欢，赠吴诗有“问疾宁辞蜀道难，相逢握手泪泅澜”之句。又有《辛丑七月雨僧老友自重庆来广州，承询近况，赋此答之》诗云：“五羊重见九回肠，虽住罗浮别有乡。留命任教加白眼，著书唯剩颂红妆。钟君点鬼行将及，汤子抛人转更忙。为口东坡休自笑，老来事业未荒唐”。是时，所撰《柳如是别传》行将完成，而连年来身体尚健，双目迷蒙可辨径道，常由师母陪同在园内散步。并能驱车到市内听京战。为过岭以来比较安适时期。

一九六二年，夏六月初十日，右腿骨跌折，住进中山二医院。因年老未动手术。当时枢曾建议请上海中医骨科专家治疗（时王子平、魏指齏最有名。曾亲闻魏言，常到外地给首长疗疾。），先生不肯，致断腿终未能复原。先生生平不信中医，在成都视网膜剥离时，如不动手术，倘获名医，服中药亦可奏效。一时手术之疏，终身无复明之道，重可伤矣。在中山医院留住半年多，由医院抬回家。陶铸同志给派护士三人，轮班照顾。六四年五月枢赴穗晋谒时，虽能由两护士右右扶持起立，不复能再如往日由师母陪同散步矣。是年夏，《柳如是别传》初稿完成。自草创至是已历十年。全书后有《稿竟说偈》曰：

奇女气销，三百载下。孰发幽光，陈最良也。嗟陈教授，愈教愈哑。丽香群闹，皋比决舍。无事转忙，然脂瞑写。成册万言，如瓶水泻。怒骂嬉笑，亦俚亦雅。非旧非新，童牛角马。刻意伤春，贮泪盈把。痛哭古人，留赠来者。

末署：“钱柳逝世三百年，岁次甲辰夏五月陈寅恪书于广州金明馆。时年七十五。”冬十月，复为写定之《论再生缘，校补记》作序云：“此文乃颉颃游戏之笔，疏误可笑。然传播中外，议论纷纭，因而发现新材料有为前所未知者，自应补正。兹辑为一编，附在简末，至于原文，悉仍其旧，不复改易，盖以存著作之初旨也。噫！所南《心史》，固非吴井之藏。孙盛《阳秋》，同是辽东之本。点佛弟之额粉，久已先乾。裹王娘之脚条，长则更臭。知我罪我，请俟来世。一九六四年岁在甲辰十一月十八日文盲叟陈寅恪序于广州金明馆”。录上二跋，可见先生此时之情怀，亦足见失明折肱后仍著述不辍之襟度也。

一九六六年(丙午)六月，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，助手黄萱被赶走不准再协助先生做工作。九月，又将公家所派护士二人赶走，仅自出资供轮班代替之护士一人得留。是后乏人扶持，折磨日益多。后来又要抬先生去大礼堂批斗，结果由前历史系主任刘节（早年学生）代表先生去挨斗。自运动起后，先生被指为特号“反动学术权威”。经历三年多的不断折磨，一九六九年十月七日晨五时半逝世。终年八十岁。

综观先生一生，屯蹇之日多，而安舒之日少。远客异国，有断炊之虞。飘泊西南，备颠连之苦。外侮内忧，销魂铄骨。寄家香江，仆仆于滇越蜀道之中（在重庆有“见机而作，入土为安”之谐语）。奇疾异遇，困顿（失明而无伴护）于天竺、英伦、纽约之际。虽晚年遭逢盛世，而失明之后，继以折肱，终则在十年浩劫中被迫害致死。天之困厄斯人抑何酷邪？先生虽有“天其废我是耶非”之慨叹，然而履险如夷，胸怀坦荡，不斤斤于境遇，不戚戚于困穷；而精探力索，超越凡响，“论学论治，迥异时流”。而忧国忧民之思，悲天悯人之怀，郁勃于胸中，壹发之于述作与歌诗。先生之浩气迥矣。

先生于学，既渊且广。先生之思，既敏且锐：犀利烛牛渚之

奸，阒邈照一代之后。综括先生学之特色——约有四端：一曰，以淑世为怀。笃信白氏“文章合为时而著，歌诗合为事而作”（与元九书）之旨。二曰，探索自由之义谛。义见《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》及《论再生缘》。三曰，珍惜传统历史文化。此意则文诗中随地见之，而“迂叟当年感慨深，贞元醉汉托微吟”、“东皇若教柔枝起，老大犹能秉烛游”之句，尤为澹荡移情。四曰，“续命河汾”之向往。此虽仅于赠叶遐庵诗，《赠蒋秉南序》中偶一发之，实往来心目中之要事。由此四者，具见先生之身实传统历史文化所托命。世或以“以诗证史”业绩推先生，不知彼仅治学之一种方法耳。昔年有某诗人呈先生诗，以谢山、董浦方先生，不识先生亭林、梨洲之俦。彼盖不识古人“拟人必于其伦”义世。

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廿二日初稿写讫于上海复旦大学寓居。及门弟子蒋天枢敬撰。

